



本期编辑:刘诗萌 美编:胡健博 校对:胡建安

寄寄老人

元代陶艺『手办』大咖

卜丁

金末元初,他曾活跃于长安及河汾一带,以精湛的制陶技艺闻名;他的作品造型规整、质地细腻,展现古代工匠高超技艺与独特审美……他就是元代制陶名匠“寄寄老人”,西安博物院现珍藏他多件作品。

“寄寄老人”是谁?“寄寄”是什么意思?他的作品为何如此受关注?

元代陶艺“手办”大咖

2021年,考古人员在西安市南郊发掘多座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墓葬,其中在一处元代家族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带有“寄寄老人”铭款的仿古陶礼器。这些仿古黑陶礼器有陶牛尊、陶象尊、陶甗、陶豆、陶鼎等,造型规整、典雅,质地坚硬细腻,表面光洁。

说到这些黑陶文物的来历,背后还隐藏着不少故事。据资料显示,这些精美的黑陶文物出土于西安南郊陆家寨元代耿氏家族墓地,该墓地共9座墓葬,其中M715号墓和M706号墓相邻,墓主人为耿伯祥和耿彦清,为父子关系。

“寄寄老人”何许人也

这些黑陶制作工艺精湛,风格独特,有人将其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上后,有网友评论“这是来自元代的‘手办’作品”。所谓“手办”,即手工制作的工艺品,通常具有独特的设计和艺术价值。而此次展出的黑陶文物,因部分带有元代制陶名匠“寄寄老人”的款识而格外受到关注。

关于寄寄老人的生平,元代学者王恽在其作品《秋涧集》第71卷《题寄寄老人陈氏诗卷》中,提及“寄寄老人”本姓陈,号“寄寄老人”,以精湛的制陶技艺闻名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在其《“寄寄老人”考》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,梳理出其人生轨迹,认为寄寄老人可能是杭州人,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制陶大师,尤其擅长砚瓦制作,故又有“研师”之称。其作品工艺精良,古朴厚重典雅,深得文人儒士喜爱,并与一些文人结为挚友。

“寄寄老人”制作的陶砚和陶器,凭借其优良的质地和古朴典雅的造型,深受当时文人墨客的喜爱,被誉为“坚润精致,粹然含金玉之质”,并称他为“甄陶师”。元初,在黄河、汾河流域汇聚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和作家,如段克己、段成己、麻革、张宇、陈庚、陈庚、房暉、曹之谦等金朝遗民,被后人合称为“河汾诸老”。“寄寄老人”与“河汾诸老”往来密切,常将自己的陶砚赠予这些文人,还收集了大量他们的诗稿,编撰成《寄寄老人陈氏诗卷》,其中诗人段成己曾为“寄寄老人”写过《赠研师寄寄翁》一诗,该诗有句“韞名书研间,聊寄吾寄为”或许能解释“寄寄”一词含义。据专家解读,第一个“寄”有寄托、安放之意,第二个“寄”则有寄居、依托之处所等含义。综合理解“寄寄老人”是在制陶与文人交往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,他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感悟,都融入到制陶这一技艺中,用双手创造出了一件件有灵魂的作品。

技绝器罕传世较少

“寄寄老人”的作品制作工艺要求极高,从选材到烧制,每一步都需要精湛的技艺和严格把控。其制作的陶器质地坚硬细腻,造型规整典雅,纹饰精细,这表明他在陶器的成型、烧制等环节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,稍有不慎,就会导致成品质量不达标,因此成品率相对较低,也使“寄寄老人”的作品在后世具有稀缺性。有学者研究发现,带有“寄寄老人”款识的文物数量有限,国内博物馆收藏有该款的陶器较少,包括有豆、尊、盂、爵、执壶、杯等类型。

元代是多民族融合的时期,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。虽然复古潮流不如宋代那样具有普遍性和强烈性,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未中断。“寄寄老人”制作的仿古礼器,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代以来对古礼文化的尊崇,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追求。

三逛胡亥墓

胜迹

严天池

答:“这没啥可逛的!南头有个冢疙瘩,是胡亥墓,啥也没有!”

因为不甘心,就顺着老者的指引,顶着午间烈日,迈开双腿,一直向南。路边并无遮荫的大树,田地里只有久不见雨、长得很不精神、已经开始泛黄的麦子。到了曲江池南边的一个半塬上,就看见了老者所说的那个“冢疙瘩”。在稀疏的麦地中间,“冢疙瘩”显得孤独而苍凉,周围没有树,没有草,甚至连人踩过的脚印都没有。好在,我们终于找见了大半截埋入地下、已经开始风化的石碑,碑上的大字只能看见两个:“秦二”。当时,已经逛过临潼的秦始皇陵兵马俑,除了感慨这父子二人陵地的奢简之别,就只想一个“逛”字,瞎逛、胡逛、野逛而已。

第二次逛胡亥墓,已经过了三十八年。这之前,改革之风劲吹,城市日新月异,曲江梦回大唐,成了现代人的福地,胡亥墓在众多豪宅的中心,经修缮和改建,大变了模样。然而,人生东奔西跑,看的风景多了,虽路过曲江若干次,却记不得回望一下曾经来过的胡亥墓。直到四年前的夏天,有朋从豫中来,扶耄耋老父逛长安,以行大孝。既是老友,当尽地

主之谊,邀约一老一少吃泡馍、啜葫芦头是肯定的,协助陪逛,看长安新旧景观,更是当然。

可惜,那日下雨,出行多有不便,我们只好让老伯不下车,坐着车在雨中逛长安,隔着玻璃看。游完老城,又逛新区,到曲江南湖南,天晴后彩虹现,老伯一时兴起,要求下车走一走路。正好驻车处,就是曲江秦二世陵遗址公园。老伯下车时,口中念念有辞:“这啥就好!这啥就好!”于是,我们扶着老伯,拾级而上,进了遗址公园。

公园不大,栽种了各样树木,有的已经相当粗壮。雨后并无游人。地砖开始干起来,树上的叶子却还是湿漉漉的。老伯兴致蛮高,踩着脚下刻着历史年代的青砖,竟与其儿论辩起胡亥这个人来。细听,这父子俩,一个有史识,一个有文才,一个兵来,一个将挡。我紧随其后,就记住了老伯的一句话:“胡亥是一个历史的玩笑,但这个人物不该忘记,他给后来为政者提供了一个最为难得的大教训。”

第三次逛胡亥墓,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分难熬的盛夏。热浪一拨接一拨,

室外反倒成蒸笼,而总待在开着空调的屋子里,又时时担心吹出空调病来。妻子建议,“咱找个个人少的地方转转吧!”于是,坐了地铁,下意识地就到了曲江秦二世陵遗址公园。

这个地方真的很小,类似一个街心公园。人很少,周边豪宅里边的人们大体看不上,也不会在这大热的天,下楼遛弯。我们在园子转过一个小圈,来到山门,念诵那“哀叹兴亡”的楹联。又上到胡亥墓前,观瞻字迹模糊的石碑。我还向妻子讲述了一通我所知道的毕沅这个人

人对陕西的贡献。妻不接我的话,却说,“这儿树多荫凉大,还是坐一坐吧。”于是,她静静地坐在那长椅上,心无旁骛地看起了她自己感兴趣的小视频。我极不耐热,尤其是今夏,听见蝉鸣,心中更燥。看园子右边有新建筑物,匾额上署“秦殇”,原来是展览馆,便一头钻了进去。馆内展品并不多,但馆中对“秦人”“秦朝”的形成、发展、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介绍得详尽而得当。参观者依然极少,而我正觉甚好。伴着馆内空调吹出的习习凉风,细细咀嚼“秦殇”这两个大字的深意,不觉已经挨过了大半天时光。

陕北洋芋

方彩琳

许多庄稼难以成活。唯独洋芋能种下,因为它维系着一年的生计。播种时节,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种子。用刀子将土豆切开,每一个芽眼便是一颗希望的种子。落入黄土,洋芋便落地生根,见土即发芽。只要一丝微风,白色的嫩芽便破土而出,渐渐舒展成嫩绿的叶片,抽出茎秆,一层层向上生长。待到花期,朵朵白色的小花点缀其间,黄色的花蕊排列齐整。此时,乡亲们会仔细锄去杂草,呵护洋芋成长。它也不负众望,奋力生长,日新月异。有时,看到根部的泥土被撑开裂缝,便知地下已是硕果累累——那累累果实挤压着大地,却仍深藏不露,只管默默积蓄力量。喜悦无需言表,淘气的孩子们忍不住用手去挖那初生的嫩土豆,白白嫩嫩,仿佛能掐出水来。刚想偷尝,却发现水汽太重,难以入口,跑回家问大人,方知“没上过面(淀粉未积累),还不能吃呢!”

秋意渐浓,其他庄稼相继成熟、枯黄,大地的主色调渐变为金黄。此时,唯有洋芋田依然执着地绿着,万黄丛中一

点翠绿或夹杂一两片早枯的叶片。大人说:“再等等,让洋芋长老些。”我们便翘首以盼。终于,秋高气爽,挖洋芋的日子到了!

欢呼雀跃的我们,扛起锄头,挎上筐子,拎着麻袋,奔向田野。小心翼翼地将洋芋一颗颗刨出,茎秆堆在一旁。收获的洋芋有白皮的、红皮的,个头大的、小的、中等的,分门别类。大的留着自家吃,中等的卖掉换钱,小的喂猪。空地上,洋芋堆成了小山,白花一片。这时,最令人期待的环节来了——挖一个小土坑,将土豆埋进去,盖上薄土,上面生起柴火,用火慢慢烘烤。不一会儿,诱人的焦香便弥漫开来,勾得人垂涎三尺。扒开灰烬,取出烤洋芋。外皮焦皱,内里金黄,靠近焦皮处带着一丝脆韧,最中心则绵软如沙,入口即化。那一刻,世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!

双手沾满焦黑的洋芋皮,黏糊糊的,得用清水好好冲洗。我们吃得满嘴喷香,笑声在田野间回荡,眼中闪烁着光芒,心底充盈着满足与爱。



收获完毕,洋芋被一袋袋倒进深深的窖里,准备供全家享用一年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黑暗中,仿佛完成了使命,安然休憩。然而,洋芋的坚韧令人惊叹。即使深藏在窖中,它依然能顽强地发芽;即使不在沃土里,也能努力结出新的果实,生生不息。

我尝过许多地方的洋芋,却始终最爱家乡陕北的洋芋。因为心在这里,魂在这里,梦在这里,根在这里。与其他一切无关。

武功东桥:横跨千年的丝路印记与时代新声

崔亦馨

古桥不仅是货物运输的通道,更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见证者。

史料记载中,东桥的“丝路基因”清晰可辨:汉武帝时期,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路,曾4次途经此地;东汉班超“投笔从戎”,在西域经营30年,数次往返于此,守护着文明交流通道;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,从长安出发后首跨漆水河,桥身石板曾留下他的足迹。

千百年间,东桥上往来的不仅有使者与商旅,更有文化与信仰的碰撞,驼队的铜铃声、马帮的蹄声、商旅的吆喝声,交织成“东来西去看,马踏终日送韶华”的繁忙画卷,使这座古桥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不可或缺的文明驿站。

东桥的石板上,更印着金戈铁马的历史烙印。传说商纣时期,大将黄飞虎叛离商纣投奔西岐时便途经此桥,桥北的东岳庙作为这一传说的实物佐证,为古桥蒙上一层神话色彩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到了近代,东桥的使命担当愈发清晰。清光绪元年(1875年),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领率新疆军务,这位“抬棺出征”的清军将领率军经东桥入疆,最终平定阿古柏叛乱,收复天山南北两路,遏制了英俄对新疆的侵略。西征途中,他令湘军战士在东桥两岸栽植柳树,这些“左公柳”不仅为古桥添景,更在日后与桥体形成特殊关联——1974年古桥改建时,人们发现水下柳树桩完好如新,经考证正是当年所植柳树遗存,可谓“绿树护桥,安邦固路”。杨昌浚笔下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反映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诗句,至今仍在两岸传扬。

民国初年,时局动荡中,东桥依旧承载着特殊意义。1921年,北洋军阀混战之际,于右任应杨虎城之邀,穿过东桥来到武功共商国是。进入革命年代,东桥更见证了民族解放的关键进程。1949年5月,王震将军率军跨桥解放武功,为后续扶眉战役胜利和大西北解放奠定基础,让这座古桥在革命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古今交响:从民生记忆到文化新篇

东桥的历史,不仅有宏大叙事,更有浸润民生的温情细节。

据武功地方史料记载,清末,道士刘道云游至漆水河畔,见此处便桥常被洪水冲毁,行人渡河艰难,便坚持“以身作舟”,无论寒暑每日背送行人过河。当地至今流传着他的善举细节:遇妇女过河时,必双手挽于身后,让妇人双膝轻跪手上,既显尊重又避嫌。刘道坚守数年,攒下行人所赠酬劳,又四处化缘筹资,最终建成一座木桥。

这座凝聚善念的桥梁,采用传统工艺建造,造型精巧稳固。百姓为纪念他,将此桥称为“刘仙桥”,其善举至今安放在当地龙王庙羽化洞内,成为“善建者不拔”的生动画证。于右任听闻其善举后深受感动,亲笔题写“刘仙桥”碑名并赋诗赞颂,为古桥增添了一抹人文温情。

1974年,因社会发展需要,古桥被改建为混凝土结构。施工中,人们发现原桥水下柳树桩保存完好,经文物部门考证,这些柳树桩正是清末左宗棠西征时所植“左公柳”遗存——当年湘军栽植的柳树,

部分被就地取材用于桥体加固,形成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(架桥)”的历史巧合。直至20世纪90年代,东桥仍是西宝公路北线连接西北各地的重要通道,承载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。

随着岁月流转,因东桥东坡土质疏松、坡势较陡存在安全隐患,当地在桥南新建了公路和大桥,这座古桥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。近年来,随着武功古镇旅游开发的推进,东桥与相邻的美阳关一同启动重修工程,吸引众多游人慕名探访。如今的东桥,背靠有“大唐第一雄关”之称的美阳关,毗邻姜嫄水乡,周边教稼台等历史遗迹星罗棋布,共同构成串联周秦文明、丝路文化与革命历史的旅游线路。桥体虽已改建,但水下保存完好的古桥墩基,仍在无声诉说着千年过往。

春日里,两岸垂柳依依,重现“东桥碧波花柳显”的意境;秋日里,漆水碧波荡漾,倒映着古桥新姿,历史与现实在此和谐交融。从黄飞虎的传说到张骞通西域的驼队印记,从左宗棠栽植的杨柳到王震大军的铁路奔涌,从刘道的善举到今日的旅游开发,武功东桥如一一位沉默的守望者,见证着文明的传承、家国的兴衰与民生的变迁。恰如关中汉子般“稳如磐石,宠辱不惊”,在岁月长河中始终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希望。

驻足东桥,方能领悟:所谓“千年”,从来不是遥远的数字,而是张骞的驼铃与今日的车流在同一座桥上奏响的不同乐章。当新时代的车轮再次碾过桥面,这座古桥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千年传奇,它的故事,也因这生生不息的交响乐而持续铺展,从未落幕。